

武漢文史資料

第二輯

周恩來、陳誠、叶挺與新四軍

楊伯濤

緬懷民主革命前輩柳亞子

曹美成

在陳誠身邊的日子

郭大鳳

抗戰初期陳誠在武漢的一席談

黃維宋瑞珂

武漢民建在解放前后的活動

華煜卿賀爾梅金斌統

大革命時期武漢政府的司法改革

黃曉東

武漢長江大橋建設的準備階段

唐秉澄

舊社會賭場一瞥

夏國璇

紛擾百年的近代武漢

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一九三九年春，政治部部长陈诚（中）、副部长周恩来（左）和新四军军长叶挺赴新四军前线视察时合影。



一九三七年柳亚子先生及其夫人、儿子与曹美成先生（后立者）合影。



柳亚子先生书赠曹美成先生的亲笔题辞

吾好遊江廣過從渝州
隨處氣尤雄如河下度
春中甫若合巽氣是
高前 轉遞長恩款餘
高臨此休身西士州但願
風雨能定色春來好食
武昌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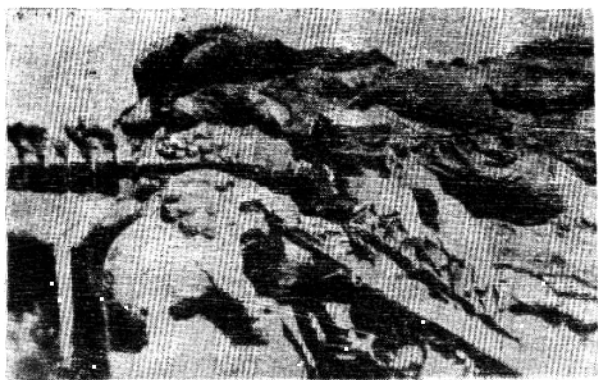
三十九年九月廿四日

勉勵牙月懷來訪公屈居

訪公作

子





“七·七”事变后，我二十九军士兵守卫在卢沟桥头



解放前“华中剿总”旧址，现为武汉教育学院

一九八七年第二辑 (总第28辑)

战 史 话	抗 战 纪 事	人 物
武汉民建在解放前后的活动	抗战初期陈诚在武汉的一席谈	周恩来、陈诚、叶挺与新四军
华煜卿	「七·七」事变后的抗敌片断回忆	缅怀民主革命前辈柳亚子
贺尔梅	抗战后期的豫湘桂战役	白崇禧在武汉(续完)
金武统	——在军统局的所见所闻	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
109	武汉会战中的岷山之役	蒋百里先生在武汉
	广济后方国共合作抗日纪事	回忆艾毓英先生
	庙台乡民兵抗日武装的发展及其战斗	
	鲍志鸿	杨伯涛
	邓翼鹏	曹美成
	王长勋	程思远
	魏书富	郭大风
		胡起祥
		吴先铭
	周 玳	
	黄 维	
	宋瑞珂	
	79	67
	76	59
		39
		22
		6
		1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

坛 旧	政 忆	技 录	科 谈	城 业	江 百	教 影	宗 剪	桑 零	沧 拾	会 态	社 百
大革命时期的司法改革 记武昌市参议会	黄晓东 梁言	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准备阶段 中美合作航空测量队 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唐襄澄 黄懋胥 李泽	陈剑函	武汉粮食业的回顾 三十年代的武汉中药材行业	孙明清 吕祥余	朱宪章	武汉圣公会与「新学」媒介作用	陈忠	昔日硚口	金薄临
123	118	146	140	127	161	153	164	172	182	176	187

周恩来 陈诚 叶挺 与新四军

杨 伯 涛

1940年，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长官部与省政府均驻鄂西恩施。担任恩施城防、长官部和飞机场的警戒任务的是一八五师，师长为石祖黄，兼恩施警备司令。我当时任该师参谋长，故又兼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常驻警备司令部办公。

1942年12月某日，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郭忏向我说：“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在重庆受到辞公（陈诚字辞修）的邀请，来恩施休养，嘱要好好保护叶将军的安全，不让闲杂人等干扰叶将军的生活行动。”叶挺将军到达恩施时，先暂住旅馆。警备司令部在湖北省银行内，与叶将军所住的旅馆，仅一街之隔。我为了履行任务，与长官部军务处长李则芬，前往晋谒叶挺将军，并见到叶夫人李秀文与女儿杨眉，我两人向叶将军恭致问候，征求叶有什么要吩咐办的事。因系纯礼节性的拜访，没有谈其它问题，片刻即辞出。这次晋谒，我对叶将军的印象是：身体魁梧，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与夫人及女儿，衣着整洁，仪表端庄，当时在恩施是很少见的。

第六战区原有苏联顾问数人，住在南门外一幢较好的民房里。苏联顾问撤走后，由郭忏参谋长派人重新修葺，将叶将军一家安置在那里。

过去我对叶将军一无所知，只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才知道一些片面的情况。这次亲自接待了叶将军，为了掌握分寸，需要了解陈诚与叶挺之间的关系；我经陈诚左右的机要人员，和由第三战区新调来的八十六军军长方日英处知道一些情况。（方在“皖南事变”时任四十师师长，是袭击新四军的主力部队。）1943年，我调任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处长，又进一步有所了解。

叶挺将军系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陈诚是八期毕业生。叶一度留校工作，为陈诚的区队长，有师生之谊；大革命时期，二人又共过事，陈诚对叶挺深为敬重。

“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淞沪战后，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则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抗战中心。在全国同仇敌忾，救亡图存，团结一致抗日的情况下，陈诚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共同负责，并聘请郭沫若、田汉、洪深等进步人士，组成政治部第三厅。在各方面的合作下，政治部内群情振奋，热气腾腾，有力地推动了抗敌救国宣传、民众动员和组织工作。

叶挺将军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一直蛰居香港，抗日救国是他从“九·一八”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抗战开始，他报国情殷，即与陈诚取得联系，探询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和战备情况。陈诚热烈欢迎叶挺将军速来武汉，共商抗战大计。叶挺到达武汉，陈诚竭诚款待。最初，陈诚建议叶出任国民政府职务，叶一时未决。后经周恩来副部长多方考虑，建议为了国共两党更精诚密切地合作，应该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以解决。这就是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赣、浙、闽、豫、鄂、皖边区和其他地带的武装游击部队。这在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官吏看来，游击队的存在，是他们的心腹大

患，日夜忧虑，寝食难安。在共产党方面，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救亡，遗留于各地的武装游击队，当此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关键时刻，已无继续坚持之必要。但又不能一纸命令将之解散，致令这些久经考验，忠贞不屈，坚持革命，艰苦奋斗的革命斗士，在脱离党的组织和领导后，无家可归，甚至无法谋生，情何以堪。这种消极的解散办法，显然是不可行的。积极有利的办法，是国共两党协商，由共产党发出号召，喻以形势和大义，负责将散处各地游击部队，分别收容集中起来，编成一支整然的部队，增加一支抗日力量，最好是交叶挺将军统帅，将之带上抗日前线，对待民族大敌。也更有利于消弭了两党历史遗留下来的裂痕，有利于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周恩来副部长把这个解决方案作为建议，向部长陈诚提出，得到陈诚的赞成。叶将军也能作为一个非党中间人士，为两党和睦作出贡献，也是对国家民族利益力所能及的贡献，同时满足了他请缨杀敌，不甘居后方的热烈愿望。因此，对周恩来副部长这一建议，亦慨然承诺。经过陈诚缜密筹划，写成书面报告，亲自面呈蒋介石，委婉陈述建议内容，分析利害得失，以坚定的语气，力主促成。经过蒋委员长考虑后，认为可行，立即批准。经陈、周、叶三位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具体执行步骤，在和谐的气氛中，分头进行，颇为顺利。唯独这支部队集中后，编入国军正式战斗序列，应赋予什么番号及隶属问题，几经磋商，还是叶挺将军提出，北伐时期的第四军，所向披靡，尤以第四军独立团，攻城略地，战无不克，有铁军之誉，为鼓舞士气，并怀念北伐时的锐气，提出这支部队以“新四军”为番号。经过周恩来与陈诚的协商，蒋介石同意，正式将这些游击武装部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辖四个支队：一支队司令员陈

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三支队司令员由张云逸兼，谭震林任副司令员；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军部政治部正副主任由袁国平、邓子恢分别担任。这些人事安排，是由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由陈诚与周恩来两位部长协商，报请军事委员会决定的。这支抗日部队建成后，军需供应，具由军委会按一般国军部队待遇。

原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武装，统向安徽南部的歙县岩寺地区集中编组；原在湖北、河南、安徽等省长江以北地区的武装，向安徽省中部的合肥、舒城地区集中编组。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建成后，由叶挺将军率领亦进驻岩寺。叶挺命令所部编组就绪后，长江北岸的新四军向皖中及苏北的日军发动进攻，长江南岸的新四军，则在南京至上海的宁沪铁路沿线两侧地区，破坏日军交通，袭击日军据点，并向皖南发展。新四军在历次战斗中，作战勇猛，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斗志。

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范围。顾祝同认为这一带无日军，命令新四军应转移到苏北，并陈兵八万余人，包围在新四军周围。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途中，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湘指挥的数个师的袭击，血战七昼夜，新四军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战死或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军长叶挺被俘。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7月，叶挺将军被解至桂林。1942年1月，又转至重庆。

陈诚在重庆几次去探望过叶挺将军，邀请叶就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陈诚一向忠于蒋介石，对于过去的反蒋人物，如严重、张发奎、薛岳、黄琪翔等都反对过蒋介石，陈诚在这些人中采取拉拢调解，把这些人由反蒋转化为拥蒋，起到作用不少。陈诚素性好动，除勤劳治军外，稍有暇时，即延揽名流，敬礼贤

达。秉此一贯作风，认为叶挺将军是争取的对象。几次与叶恳谈，劝之附蒋，希望得到叶的首肯，但都遭到叶的拒绝。陈又向蒋汇报说，如蒋能亲自召见，加以抚慰，可能使叶挺就范。蒋介石亦表同意。

陈诚为了动叶以情，特派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前往重庆劝驾。郭是保定军校六期生，与叶挺素有交谊。1942年5月，郭至叶处说：“委员长亟欲见兄一谈，特要我来迎候，请一道前往。”

蒋介石与叶挺见面时，蒋先询问了叶在重庆的休养情况，又问及对皖南事变的看法和今后的打算。叶挺声明自己在皖南没错，请求释放在上饶集中营监禁的新四军干部，并恢复新四军这一支抗日部队，丝毫没有附蒋的态度。蒋叶之间的谈话，也未使叶有所转变。

陈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遂报请蒋介石批准，最好将叶转移至恩施休养，得到蒋的认可。陈将这个决定告诉叶挺，陈态度诚恳，叶慨然应允，借以解脱在重庆的禁锢生活。

1942年12月，叶挺将军由重庆转移到恩施，陈诚礼遇备至，叶得以安静休养。每日除阅读书报外，经常与夫人、女儿在住宅前后散步、种菜养花。

1943年5月，鄂西会战时，我军收复五峰渔洋关。日军溃退后，重庆组织由居正为首的慰问团来恩施，名记者陆诒亦为慰问团成员。由重庆出发时，周恩来同志托陆诒带给陈诚一封亲笔信，信中请陈准许陆诒面见叶挺。陈当即慨然应诺，陆当日即与叶见了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第六战区与湖北省政府，均迁回武汉，叶挺将军不便再留恩施。经郭忏向重庆请示后，遂于同年8月28日，礼送叶将军起程，安达重庆，告别了两年又八个月的恩施。

缅怀民主革命前辈柳亚子

曹美成



1938年，日本侵略者疯狂轰炸武汉，我的长辈为了我们子女的安全，要我们到香港去避难。当时，广州大学在香港设了分教处。名为分教处，实则学校大部分的图书仪器都已运往香港，主要教授多半也在香港。是年秋天我考进了广州大学。

在香港读书期间，我有幸拜识柳亚子先生。

初谒亚老如坐春风

当时的香港，是一些民主革命前辈、进步文人学者集中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同志也有在那里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张一尊、梁漱溟、茅盾、邹韬奋、金仲华、胡愈之、刘清扬、千家驹、萨空了、夏衍、胡乔木、范长江诸位同志都在那里。后来听说廖承志、李少石也在那里，但没有公开活动。蔡元培先生也隐居在香港，去世后才公开。

香港殖民统治者，只要不反对他的殖民统治，其它一概不管。因此，一些进步报刊书籍都可以在那里公开发行。如邹韬奋

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中共在那里主办的《华商报》，梁漱溟主持、萨空了主编的《光明报》（即现在《光明日报》的前身），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这些报刊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作为“南社”创办人、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常常在这些报刊上发表诗文。

1941年初，我因母病回汉探望，母亲患的是高血压，延请外国医生医治不当，于这一年的3月17日逝世。我又重返了香港。这时候，柳亚老已从上海到香港。他的诗作《图南集》中的篇章，陆续发表在《国民日报》上，有的诗，至今不忘。记得在悼念鲁迅先生逝世5周年的时候，他写道：

鲁迅先生今圣人，毛公赞语定千秋。
死开铁血鏖兵局，生是金刚历劫身！
团结未坚愁抉目，澄清有待漫伤神。
沪郊展墓知何日？护榭难忘民族魂。

柳亚老是我仰慕已久的革命前辈，很想有机会拜见，面聆教益。于是，我写信给《立报》，转交柳先生，请求柳老约时会面。没过几天，我接到回信，约我在亚老家中接谈。

亚老住在九龙柯士甸道107号的二楼。（亚老取名“羿楼”，取后羿射日之意。）

那一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到了羿楼。亚子先生身着白布短褂裤，与我坐在客厅的桌旁交谈。他是一位蔼然长者，与他交谈如坐春风。他仔细地询问了我的年龄、籍贯、家庭和学习情况。我也问亚老“高龄几何”？柳老告诉我是54岁。他老人家又问我：“有小孩没有？”我说没有。亚老说：“有小孩，有益于民族的延续，没有也没有关系。”亚老开阔的胸怀，使我深受感动。以后我一直没有小孩，并不以为憾，是亚老教育我的结果。言谈中我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为我母亲写一个《墓碑铭》。亚老答应了。我将一份“哀启”面呈亚老，告辞而去。

母亲的墓碑铭

我母亲去世后，我曾经写了一份“哀启”，叙述母亲的生平。将母亲生前的点滴情况，都写在上面。那天告辞亚子先生时，我就将“哀启”面呈柳先生，请亚老写一墓碑铭，让先母的懿德，因亚老的大文而传于世。

拜别不久，就收到了先生寄来的《墓碑铭》。寥寥数百字，概括了先母的一生。先生苍劲有力的小楷写在红色的小字格子纸里，至今印象犹深。全文抄下：

《曹母艾太君墓碑铭》

曹母艾太君，湖北武昌人，曹翁云阶德配，而吾友美成之贤母也。诞自德门，生有懿行，年二十，归曹翁，于养亲持家之微，靡纤毫弗备者。初生子美藻，幼殇，继乃育美成，爱之甚，即望之甚切。世俗妇女之称母教也，喜严琐碎细节，语言繁于牛毛，于大体则懵焉无睹。太君独弗然，其诲美成，不为苟徇，惟重名检。方美成髫髻时，游曹翁经营之布肆，拾铜币于地，归而玩弄之，太君大不怿，责令返还原处，以为临财毋苟得之义，当如是也。既弱冠，盛暑外出，施香于巾，以避秽恶，太君疑作狎邪游，复严斥之，美成辨晰乃已。呜呼！利禄之污，声色之诱，天下奇男子伟丈夫，失足而不可拔者奚限，知太君之垂诫深矣！晚岁患血压过高，以放血法治之，卒弗瘳。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七日歿，距生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七。子六：美藻、美成、美鼎、美浩、美鸿、美全，藻鼎并殇，浩庶出。女六：伤其二，存者美珍、美瑶、美琛、美璋，璋亦庶出。孙二：家骏、家骥，美浩出。太君之歿也，武昌已久沦于倭寇，纵其丑类，坏冢墓，发棺槨，民弗堪命。曹翁乃錫石以藏太君遗榇，将俟中原光复之辰，治高塋而礼葬焉。美成负籍香港，识吴江柳亚子，乞预为表墓之铭。铭曰：

贤母之坟，孝子之心。

弗侵弗伐，郁郁千春。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六日

吴江柳亚子谨撰。

我得到亚老的大作，奉若拱璧。原来，母亲去世后，我们将她的灵柩，运到了武昌大东门外的长春观，观内有一座“老厝屋”，屋前有一片菜地，母亲的灵柩，就浅葬在菜地里，上面用石砖砌着，准备抗战胜利后，再正式移葬到合适的地方。亚老在《墓碑铭》中，说“曹翁（我父亲曹云阶）乃錡石以藏太君遗榇，将俟中原兴复之辰，治高塋而礼葬焉。”就是指的这件事。

得了亚老的手稿后，我用宣纸请裱画店打好红格子（这叫“乌丝兰”），将纸送到亚子先生家中，请亚老书写，以便将来刻碑。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亚老在中共地下同志的帮助下，到了内地。那张“乌丝兰”也丢失了。

九龙、香港相继陷落，我不愿受日寇的蹂躏，准备去重庆转学。1942年2月，离开九龙，经澳门、广州湾（即今湛江市）、玉林柳州到了重庆。当时的政府根本不管此事，转学毫无希望。时中央大学在坪石开课，我又到了坪石，时间已是秋天了。这时候我得到一个消息：亚老已在桂林定居了。我仰望心切，即匆匆乘火车去看望他老人家。

火车到了桂林，已经很晚，我在环湖旅社住下，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丽君路南一巷亚老的家，敲门进去，先生正在刷牙，见到有人进来，先是一愣，当他认清是我时，无限欣喜，留我住了一天，随后又回到坪石。后来广州大学迁曲江复课，我即到曲江恢复了学业。

到曲江后，得知亚老写的《墓碑铭》在熊佛西先生主编的《文学创作》上发表，亚老在碑铭后面还加了跋语。

后来在桂林，亚子先生为我重写了墓碑铭，写在一张八尺宣纸上，书法有晋魏人风。亚老生平很少作楷书，亚老的老友看后，认为这是亚老平生仅有之作。

一份谴责反共的电稿

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发生，轰动世界，时居香港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合发表声明，谴责反动派的罪行。

在九龙柯士甸亚老家中，亚老曾将那份铅印的联合宣言给我看。这个宣言发表后，海外爱国侨胞，纷纷响应。司徒美堂领导的美洲洪门总部，也相继通电国民党政府，表示谴责。

亚子先生告诉我，这份联合宣言，是由他起草的。宣言中有这样的话：“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抗战进入第五年度，敌人失败之局已定，国际于我有利之势已成，今年已迫近最后胜利之年。我国人自当坚信而共作决心以赴之。惟是日寇失败命运之决定，并非即为我民族解放之最后完成，我之抗战尚未脱离危机，仍须经历更大艰难困苦，则诚如总裁今年元旦之昭示……”

“然而，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闻，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毁于一旦。而时势所趋，又非昔日。则我国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不堪设想矣。”

“夫共党问题：原为世界性之问题。世界之病态不除，则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我总理过去提出与共产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伟业，此事勿容变更。总理临终时曾致书苏联，其旨：外在联合苏联，而内在训示吾人应以国内和平合作团结互助为重。诸同志对此当能念念不忘。今者日寇欲置我国于殖民地，日

寇不独为我党之敌人，亦正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敌人，即为我之良友，故吾党不宜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总裁所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皆有抗日救国之责任，早已普及深入于国人之心。乃有胜利抗战进入第五年度。今年成为最艰辛最重要之一年，而剿共问题，恍若迫在眉睫。引起国人惶惑，招至友邦疑虑，又为敌人之乘间找隙，造成便利机会。因此，不得不望于总裁暨中央诸同志之毅然决然，共谋国内和平之巩固。窃以为慎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奠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至于共产党之所言所行，苟系有违国人公意，必不为国人所爱护，何须施诸武力；如其有力可用，我党自当询国人公意而加以爱护，异之有用之地，亦无所用其危疑。我党政策，彰彰在人耳目，如何发扬广大，责仍在我。凡诸所陈，率秉爱国爱党之衷心，希垂察焉。1941年1月12日”

宣言发出后，蒋介石为和缓民愤，派当时住香港的海外部长吴铁城，拿着蒋的亲笔信，几次来柯士甸道找亚老，希望他去重庆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作为亚老后辈的陈立夫、朱家骅等，也写信请亚老去重庆。皆被拒绝。亚老写了一份电稿，交给时居香港的蒋介石代表俞鸿钧以快邮代电发出。全文如下：

国民党中央党部：

承召谕，同济时艰，惭感无任。惟是士君子出处，大节自有本末，闻量而后入者矣，未闻入而后量也。此次新四军不幸事变，中枢负责人士，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怨，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士民切齿，而当事者犹未闻有悔祸之心何也？在昔奉天罪已，唐室因以中兴，韩原怀谏，晋侯于焉复国。以今烛古，无待著龟矣。谓当开诚布公，予天下以共见，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

政，团结友党。涤宦海之颓波，驱岬夷子穷岛。庶几还我河山，成功有日。余虽无状，原当拒衣扶杖，乐观太平耳。否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薇，甘学夷齐；南海沉渊，普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临电陈词，刀锯待命，总理在天之灵，实昭鉴之，匆匆不备。

就因为这份电稿，亚子先生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先生对我说：“开会的时间（指国民党中央全会），于右任、冯玉祥不大赞成。我的血管里，流的是国民党的血，我是中山先生最忠实的信徒，蒋介石是叛徒，三大政策的叛徒，我能开除他，他不能开除我！”

亚老对汉奸汪精卫，更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我与先生在香港皇后道“国泰剧院”看凤子主演的《北京人》（曹禺编剧）散场之后，到“悦来酒家”吃饭，亚老说：“汪精卫这个人，不是做了汉奸，政治生命才完结的，而是在大革命反共以后，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的。”

水缸和酱油瓶

1942年下半年我在曲江广州大学复学，住在黄田坝一所木板房子里。一个严冬的夜晚，寒气逼人，我将母亲的遗照，装在信封里，写了一封信给亚老，请求他老人家给母亲题“像赞”。不久，我如愿以偿。先生像赞写道：

“惜音懿德，蔼蔼慈容。
如何中寿，遽返瑶宫。
聿有令子，幼学颉颃。
遭时多难，避地粤中。
顾瞻江汉，白云万重。
遗像在堂，慕念无穷。”

可惜这幅墨迹，后来毁于大火。1942年底，日本飞机在曲江